

阜阳侯与“阜阳侯国遗址”辨议

常泽宇

提要：东汉济南王子刘显获封的阜阳乡（亭）应不出济南国境内，阜阳乡（亭）与阜阳明清方志所载“阜阳城”遗址仅地名相似而已，并不等于两者之间就一定存在着承继关系。临泉岗上所谓“阜阳侯国遗址”，实乃脱胎于清代道光以来地方学者“层累地造成的”现代认知，未可遽断为刘显阜阳乡（亭）故城。从地理方位以及考古遗存等情况看，岗上古城应当就是《水经·颍水注》所记“邸乡城”。

关键词：东汉 阜阳侯 临泉 阜阳侯国遗址 邸乡城

一

《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记有顺帝永建元年（126）立阜阳侯刘显为济南王一事。^① 刘显祖父济南安王刘康，系光武帝与郭后所育之第三子^②，父济南简王错，兄济南孝王香。安帝永初二年（108），封香弟四人为列侯，刘显被封授阜阳侯或在其时。^③ 延光四年（125）三月甲戌，香薨，无子，国绝。^④ 顺帝永建元年六月己亥，刘显以阜阳侯绍封济南王，是为济南釐王。^⑤ 前面提到，刘显获封阜阳侯，或在安帝永初二年济南王刘香弟四人封侯时，那么，作为刘显王子侯封邑地名的“阜阳”应在何处呢？

汉制，王子侯后又有恩泽侯、外戚侯、宦者侯三类，统称列侯，而东汉时列侯又可分为县侯、乡侯、亭侯三个爵级，县侯最高，亭侯最低，功大者食县邑，小者食乡亭。县侯多封授于功臣与外戚，乡侯、亭侯多系诸侯王子弟。宦者侯则以县侯为主，乡侯、亭侯次之。^⑥ 据学者统计，西京一朝王子侯计407位，均为县侯，而东汉的342位王子侯，则有县侯、乡侯、亭侯的等级之差，且以乡、亭侯最众，县侯较少。一般认为，两汉王子侯分封的上述差异，是东汉宗室地位降低的反映。^⑦ 再具体到郭后五王（即东海、沛、济南、阜陵、中山），文献明载的王子侯授封凡18次88位，可知县侯者也不过4例而已。^⑧ 这样看来，刘显受封为县侯的可能性恐怕不

① 参见《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标点本，第1433页。

② 参见《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列传》，第1423页。

③ 参见《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列传》，第1432—1433页；《后汉书》卷4《和帝纪》，第191页。

④ 参见《后汉书》卷5《安帝纪》，第241页。

⑤ 参见《后汉书》卷6《顺帝纪》，第253页。

⑥ 参看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第50页；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7页；韩亚男：《东汉列侯的等级、绍封及传袭特征探讨》，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7页。

⑦ 关于两汉王子侯分封的统计，可参韩亚男：《东汉列侯的等级、绍封及传袭特征探讨》，第7—10页；秦铁柱：《两汉列侯问题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63—64页。冯辉则统计为331人，见《两汉列侯的分封及其演变》，收入郑学檬主编：《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庆祝韩国磐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页。

⑧ 四例分别是明帝永平元年（58）封沛献王刘辅子刘嘉为僮侯（《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列传》，第1427页）；永元十一年封济南王刘错弟刘显为西平昌侯（《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列传》，第1432页）；和帝元兴元年（105）封沛节王刘正弟二人为县侯（《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列传》，第1427页）。

大，加之“阜阳”无同名汉县相对应，更不详其食邑户数，那么，刘显推恩受封之阜阳侯，应属于乡亭侯级，封邑“阜阳”亦即某县之乡亭名。^①

令人遗憾的是，《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以及其他中古时代的文献均不见“阜阳”这一封邑地名的更多信息，我们难以对其方位作出较为精确的判定。不过，《后汉书》为我们保留东汉一代王子侯分封之制及其封邑地理的零星线索，或于“阜阳”今地的寻找有所裨补。

西汉武帝时行推恩令，即诸侯王子弟分封必以本王国之地，且封邑脱离原诸侯王国，别属邻近汉郡。这一举措颇为巧妙地实现了削弱诸侯王国实力和封建诸侯王子的双重目的。进入东汉，王子侯的分封不再以削弱王国势力为目的。^② 柳春藩曾指出，东汉乡亭级王子侯的推恩分封一般仍在王国封地之内。^③ 柳氏此说已得乡亭级王子侯封邑地理之实，唯其立论证据稍显单薄。综合《东观汉记》《后汉书》以及《水经注》记载，可确定封地方位的乡亭级王子侯，见于以下四例：

1. 都乡侯刘翼。安帝永初七年（113），封河间王刘开子刘翼为都乡侯。^④ 后又立都乡侯刘翼为平原王嗣。^⑤ 建光元年（121）五月，平原王刘翼被贬都乡侯。^⑥ 《后汉书·章帝八王传》载，刘翼被贬都乡侯之后，“遣归河间。翼于是谢宾客，闭门自处”^⑦。据此，则刘翼都乡侯封地应在河间。2. 泰山五乡侯。永宁元年，封济北节王刘登弟五人为乡侯，“皆别食太山邑”^⑧。是则济北五王子侯，封邑皆在与济北国东邻的泰山郡。3. 解渎亭侯刘淑。《后汉书·灵帝纪》载录灵帝刘宏世系，谓：“曾祖河间孝王开，祖淑，父苌。世封解渎亭侯，帝袭侯爵。”^⑨ 另据《水经·澭水注》：“（澭水）东南流，迳解渎亭南。汉顺帝阳嘉元年，封河间孝王子淑于解渎亭，为侯国，孙宏，即灵帝也。”^⑩ 又桓帝崩，“（窦）武召侍御史河间刘儵，参问其国中王子侯之贤者，儵称解渎亭侯宏。武入白太后，遂征立之，是为灵帝”^⑪。准此可明，阳嘉元年（132）所封刘淑之解渎亭侯，其封邑当在河间国内。4. 参户亭侯刘博。桓帝延熹四年（161），“立河间孝

^① 关于东汉乡亭侯不置国的讨论，参见严耕望：《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第54页；秦素银：《两汉侯国的动态考察》，《南都学坛》2007年第5期，第10—11页；秦铁柱：《两汉列侯问题研究》，第110—111页；赵海龙：《东汉侯国地理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15页。其中秦铁柱强调，所谓的乡、亭侯“就国”，“其实是回到食邑所在之县，并非真正的封国”，其分析很有道理。《续汉书·郡国志》胪列了104侯国，也未见一例乡亭侯国，亦可作侧证。东汉乡、亭侯封邑所指称的“国”，并无“侯国”建制之实，应无疑义。

^② 关于西汉王子侯国与推恩法的研究，详参马孟龙：《西汉侯国地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71—272页。东汉的情况可参赵海龙：《东汉侯国地理研究》，第28—30页。

^③ 参见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第183页。秦铁柱亦主此说，见《两汉列侯问题研究》，第64页。

^④ 参见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11《澭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73页。按，时常山国有都乡县，《续汉书·郡国志》中为侯国。杨帆主张刘翼所封都乡侯为乡亭侯，可从。详参杨帆：《东汉州郡沿革表·东汉列侯制度的相关问题》，第946页。承杨帆先生以未刊稿赐示，谨致谢忱。

^⑤ 《后汉书》卷55《章帝八王传》，第1810页。

^⑥ 《后汉书》卷5《安帝纪》，第233页。

^⑦ 《后汉书》卷55《章帝八王传》，第1809页。

^⑧ 《后汉书》卷55《章帝八王传》，第1807页。

^⑨ 《后汉书》卷8《灵帝纪》，第327页。

^⑩ 《水经注疏》卷11《澭水》，第1071页。

^⑪ 《后汉书》卷69《窦武传》，第2241页。

王子参户亭侯博为任城王，以奉其祀”^①。按《水经·浊漳水注》引应劭曰：“平舒县西南五十里有参户亭，故县也。”^②是河间王子封于河间也。

从上引史例可见，河间王子弟乡亭侯分封，大体不出河间国境，而济北五王子侯“皆别食太山邑”，这只能是较为罕见的情况，因而史传中予以特别交待。此外元初五年彭城考王弟刘丁受封鲁阳乡侯之事，据李贤注引《东观记》可知，其中刘丁获封鲁阳乡侯。^③另《后汉书·丁鸿传》记有建初四年（79）迁徙封丁鸿为鲁阳乡侯一事。关于此鲁阳乡的方位，李贤注引《东观记》曰：“鲁阳乡在寻阳县。”^④若依此来看，刘丁鲁阳乡侯封地或亦远在庐江郡寻阳县，似可视作乡亭侯所封不尽以本王国之证。不过，关于鲁阳这类乡亭名称，我们也不能排除“异地同名”的可能。《续汉书·郡国志五》刘昭注引《东观书》载，桓帝永兴元年有3682乡，12442亭。^⑤秦汉之世，县名相同都在所难免，何况是数以千万计的乡亭名称？^⑥盖鲁阳乡侯刘丁尚不能成为确认乡亭级王子侯分封不必以本王国之地的充分证据。

从以上揭橥现象看，柳氏所言不虚，东汉乡亭级王子侯推恩分封，惯以本王国之地。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大致推定济南王子刘显的阜阳乡（亭）也应不出济南国境内，即今济南市东部、滨州市西南部以及淄博市西北部的古济水沿岸地区。

二

当今流传所谓“阜阳侯国遗址”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清地志所记“阜阳城”。成化《中都志》云：“阜阳城在（颍）州西一百五十里废沈丘县南，今置邮舍在其中。”^⑦此说为正德《颍州志·古迹》所承，并言其“城不详所筑”^⑧。同书《凡例》曰：“古迹采摭，有典故载古志，非耳目所及，隐于子史百氏者，近似必录；其名实荒唐者不纂。”可知明时颍州以西、废沈丘县（治今临泉县城西古城社区内）以南确有一名为“阜阳”的古城址，但其始建于何时何人已不可考，故未做更多解说。之后，从明嘉靖至清乾隆的四种颍州方志莫不相袭。^⑨到了纂修乾隆《阜阳县志》时，又于“阜阳城”条之下略施按语，推断其得名合自汉新郪（郪邱）与隋颍

^① 《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列传》，第1444页。

^② 《水经注疏》卷10《浊漳水》，第1001页。《中国历史地图集》也将东汉的参户亭标绘于河间国东平舒县西南，应是对前引《水经注》记述的认可，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2册，第47—48页。又，据今人杨馨远、黄建芬考证，《水经注》记载无误，东汉参户亭故城应在平舒城西南，即今河北省大城县完城村南200米的古城遗址，参《论汉代参户故城地理位置——兼论东平舒县治位置》，《历史地理》第1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45—151页。

^③ 参见《后汉书》卷50《孝明八王列传》，第1671页。

^④ 《后汉书》卷37《丁鸿传》，第1264页。

^⑤ 参见《后汉书》志第23《郡国五》，第3533页。

^⑥ 县级政区的“异地同名”现象为两汉所习见，前人已多有举证，可参钱大昕撰：《十驾斋养新录》卷第11“汉地理志县名相同”“后汉县名相同”条，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260—262页。

^⑦ 柳瑛撰：成化《中都志》卷3，明弘治刻嘉靖隆庆增修本。

^⑧ 正德《颍州志》卷1《古迹》，“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影印本，第41页。

^⑨ 分见嘉靖《颍州志·舆地志下》“故迹”下“阜阳城”条，嘉靖十五年（1536）刻本；张明华、郑斌校笺：顺治《颍州志》卷2《舆地志下·城址》“阜阳城”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11页；邓建设点校：康熙《颍州志》卷3《古迹》“城邑”下“阜阳城”条，黄山书社，2019年，第47页；安徽省阜阳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乾隆《颍州府志》卷2《建置志·古迹》“颍州府”下“旧阜阳城”条，黄山书社，2006年，第121页。

阳二县之义。①

道光年间，关于“阜阳城”与阜阳县名由来的叙说变得更为具体，道光《阜阳县志》不仅明言“阜阳城”得名合二县之义说系“牵合附会其支离，无庸辩矣”，还以“《汉书》有阜阳侯，顺治间王天民《州志》亦列有阜阳城”为据，认为“是阜阳城或即汉侯国故址，偶以书纪阙载，存其名而弗深考，亦未可知”②。这种看法首次将史传中的东汉阜阳侯与阜阳旧志中的“阜阳城”相关联，似乎较为圆满的解释了旧志所载的“阜阳城”始建于何时何人以及清代阜阳县何以为名的一系列问题，自然引起后世重视。如20世纪50年代李诚在《安徽省各县市名称考释》一文中就说到：“阜阳疑为后汉置阜阳县之由来。清置阜阳县，又系根据古代县名。”③ 李氏此处显然是取信道光《阜阳县志》之说。80年代初，阜阳学者王襄天也先后两次撰文，进一步阐述“阜阳城”得名及方位：“今有‘黄岭’，地名既有‘岭’字，应该有座土岭。‘岭’是山岭，‘阜’有土丘、丘陵之义，山岭南面为阳，黄牛岭南面建城称阜阳城，应该是名正言顺的。”“汉刘邦封夏侯婴为汝阴侯，秦朝就有汝阴名称，刘显被封为阜阳侯，今黄岭地方（笔者注：今临泉县西部），应先有阜阳名称。”④

经地方学者不断讨论，“阜阳城”得名合二县之义说近乎被彻底摒弃，而明清阜阳旧志中的“阜阳城”即东汉刘显阜阳乡（亭）故址的看法后来居上，渐成主流，被80年代之后所修市县两级地志及主流大型古今地名工具书著录。以下略举三例：如《阜阳市志·大事记》曰：“永初元年（107年），刘祜封济南王刘错之子刘显于汝阴县西部为阜阳侯。”⑤ 又如《临泉县志·地理编》第一章第二节“建置沿革”下记：“永建元年（126年），封刘显为阜阳侯，置阜阳侯国，至永兴元年（153年）废。”⑥ 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第一卷“安徽阜阳市”下云：“清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改颍州为颍州府，增置阜阳县，府、县同治，以县境旧有东汉阜阳侯故城为名。”⑦

在今安徽省临泉县白庙镇岗上村以北有一处汉代城址，文物部门登记为“阜阳侯国遗址”（也称作“阜阳城址”“侯国城城址”）。⑧ 根据《阜阳文化史·史前至魏晋南北朝卷》一书介绍，这是一处面积达73万平米的方形高台地。50年代调查时尚可见城垣、城壕遗迹，2007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时仅存部分城壕。城内曾出土陶拍以及大量砖、瓦构件。⑨ 关于岗上古城与明清阜阳方志中“阜阳城”的关系，胡天生曾做出如下总结：“阜阳侯国在今临泉县白庙镇姚集

① 参见乾隆《阜阳县志》卷1《舆地》、卷3《古迹》“旧阜阳城”条，乾隆二十年（1755）刻本。

② 道光《阜阳县志》卷1《舆地一·沿革》“沿革考一”、卷2《舆地二·古迹》下“旧阜阳城”条，民国7年（1918）刻本。

③ 李诚：《安徽省各县市名称考释》，《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3期。

④ 参见王襄天：《阜阳名称的来历》，《阜阳报》1980年5月5日；《阜阳史考》，《阜阳社聐通讯》1980年5月总第6期，后收入其著《阜阳记事录续集》，阜阳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阜阳市老年专家协会编印，2008年，第17—20页。

⑤ 阜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阜阳市志》，黄山书社，1993年，第9页。

⑥ 临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临泉县志》，黄山书社，1994年，第29页。按此处封刘显为阜阳侯当在安帝永初二年（108），阜阳侯刘显绍封为济南王则在永建元年，前已述及。

⑦ 崔乃夫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954页，又如戴均良等主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中册，第1840页；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下册，第1680页。相关条目，皆大同小异，并无多少出入。

⑧ 参见临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临泉县志·文化编》，黄山书社，1994年，第389页。

⑨ 参见王秋生主编：《阜阳文化史·史前至魏晋南北朝卷》，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21页。

村，汉光武帝第三子刘康之孙刘显的封地……永建元年（126），顺帝立刘香的弟弟阜阳县侯刘显为济南王，继承刘香的爵位，阜阳县侯国遂废。但是，阜阳县的地名却保存在旧志中。”^①

另外，更有学者认为，清雍正十三年（1735）为颍州府增设附郭县命名阜阳县，“应该源自东汉阜阳县侯国”，因已与清初水文不符，未再称新县为汝阴，故取境内古城之名为阜阳县。^② 总之，旧志中的“阜阳县城”即今安徽临泉岗上古城，系东汉时刘显所封之“阜阳县侯国城”的说法，俨然成为部分地方史学者笔下信史。

不过，通过上述文献梳理，我们可以看到，从正德《颍州志》中“不详所筑”的“阜阳县城”这一原点，到今日所谓“阜阳县侯国遗址”这一终点，实乃由潜在走向显在地历时性建构的结果。若是仔细考察，也不难发现这一建构过程若干环节存在逻辑缺陷和认识盲区。

道光《阜阳县志》首次将史传中的东汉阜阳县侯与阜阳县旧志中的“阜阳县城”相关联，看似合理，但不免流于推想，并无多大实证意义。进言之，东汉刘显获封某县阜阳县乡（亭）与清代阜阳县西部的“阜阳县城”仅地名相似而已，并不等于两者之间就一定存在承继关系。我们之所以做此判断，是因为包括道光《阜阳县志》在内的阜阳县历代旧志两汉封爵表部分对境内列侯逐一胪列，王子侯如慎侯刘赐、汝阴侯刘信，功臣侯有汝阴侯夏侯婴、葛陵侯铫丹，外戚恩泽侯有鲖阳侯阴庆，宦者侯如褒信侯李元，但均不见阜阳县侯刘显。^③ 在这种情况下，道光《阜阳县志》之“沿革考”不能理解为清人已将刘显所封之阜阳县乡（亭）认定为“阜阳县城”前身。后人显然是没有理解或有意忽略其中的推测成分，并援以叠加附会，想当然地把两者视为简单的先后承袭关系，且完全无视历代旧志中封爵表两汉部分不载阜阳县侯的事实，是极不严谨的做法。

三

2015年冬，笔者前往临泉县岗上村一带实地踏勘，岗上古城所在台地平坦开阔，部分压在民房建筑下。地表现为耕地，多见绳纹瓦片。走访居民得知，历年陆续出土战国蚁鼻钱、铜箭镞、汉代板瓦、几何纹长方砖、陶豆柄等遗物。城址南面的流鞍河北岸，有一处两级高台地，俗称“冢子”，文物部门定名为“岗上遗址”^④，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历年出土有石斧、石镰、骨镞、卜骨、陶鬲和陶罐等。据2017年度遗址西部断崖清理可知，岗上遗址年代涵盖龙山文化时期、二里头文化时期、商代、西周、春秋、汉代，又以商周和汉为主。汉以后，该遗址彻底废弃，现为农田。^⑤ 要之，岗上村一带，是一处上起先秦、内涵丰富、颇具规模的聚落遗址，及至

^① 参见胡天生：《阜阳疆域建置沿革》，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16页。

^② 参见刘奕云：《“阜阳”之名谳疑》，收入其著：《可在轩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9—172页。另《阜阳通史》援引阜阳县地名办公室编印的《阜阳县地名录》（第647—649页）罗列了3种意见，并认为沿用东汉阜阳县侯国名称的第三种说法较为可信，见张宁等著：《阜阳通史》，黄山书社，1998年，第16—17页。按，作为县级政区地名的“阜阳”，恐与东汉阜阳县侯无甚关联，当渊源自明清地志中那个“不详所筑”的“阜阳县城”。又，“阜阳县城”之得名也难说一定就与“黄牛岭南面建城”有关，“阳”乃美称，两汉以“阳”为地名者极为普遍，并不都是表示山南水北，见周庄：《地名带“阳”字未必表示水北山南》，《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页。

^③ 分见嘉靖《颍州志·封爵表》；顺治《颍州志》卷9《封爵表》，第307页；康熙《颍州志》卷9《封爵》，第116—117页；乾隆《颍州府志》卷5《秩官表·封爵》，第232—233页；乾隆《阜阳县志》卷7《秩官》“封爵”下；道光《阜阳县志》卷8《秩官志·封爵》“历代封爵世表”。

^④ 参见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安徽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2014年，下册，第123页。

^⑤ 承蒙阜阳市博物馆杨玉彬先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小雷先生、临泉县博物馆邢伟先生告知“岗上遗址”及“阜阳县侯国遗址”详情，特此致谢。

两汉，整个聚落中心已由南部的“冢子”转移到北部的城邑内。

据前文所论，东汉济南王子侯刘显获封阜阳故城理当在古济水沿岸地带，那么，安徽临泉岗上古城究竟是历史上哪一座城邑？《水经·颍水注》一段记载尤为值得关注：“（汝水别渎）又东迳南顿县故城南，又东南迳鲖阳城北，又东迳鲖乡城北，又东迳固始县故城北，《地理志》，县，故寢也，寢丘在南，故籍丘名县矣。”^①

汉晋鲖阳故城即今临泉县西境鲖城镇鲖东村古城^②，临泉县城关街道沈子国古城又系西汉寢县、汉魏固始县之所在^③，是则位于“汝水别渎”以南、鲖阳城以东，固始县以西的鲖乡城，当不出今汾河以南临泉县鲖城与城关两地之间。岗上古城东去固始故城21里，西去鲖阳故城28余里，既合于熊会贞鲖乡城“当在今沈丘县西南”之按语^④，又是介处其间的唯一一座汉代城址，揆诸汝颍交通地理形势及考古学文化内涵，岗上古城应即汉魏鲖乡城之所在。

综上所述，临泉岗上所谓“阜阳侯国遗址”，与东汉王子侯分封制度多相龃龉，实乃脱胎于清代道光以来地方学者“层累地造成的”现代认知，未可遽断为刘显阜阳乡（亭）故城，而从地理方位以及考古遗存等情况看，岗上古城应当就是《水经·颍水注》中所记的介于鲖阳、固始两县之间的那座“鲖乡城”。

附记：本文得到业师王妙发先生、复旦大学马孟龙先生、上海大学胡宁先生、故宫博物院熊长云先生等指正，在此谨致谢忱！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水经注疏》卷22《颍水》，第1829页。

^② 参见《中国文物地图集·安徽分册》，第124页。

^③ 关于汉固始县地望考辨，参看徐少华：《孙叔敖故里封地考述》，《江汉考古》2008年第2期，后收入《荆楚历史地理与考古探研》，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70—175页。沈子国古城考古调查情况，见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泉县博物馆：《安徽临泉县沈子国古城遗址调查报告》，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安徽省考古学会编：《文物研究》第19辑，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94—95页。

^④ 《水经注疏》卷22《颍水》，第1829页。按，明清沈丘县在今沈丘县老城镇。又，天星观简与包山简27、32等均有“鲖阳君”记载，“鲖阳”应为战国中期楚地邑名。何浩、刘彬徽认为此“鲖阳”即《水经·颍水注》所记“鲖乡城”之北的今河南沈丘县南境，参见何浩、刘彬徽：《包山楚简“封君”释地》，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附录二五，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569页。郑威也将楚之“鲖阳”推定在今临泉县城西与鲖城镇之间，见其著《楚国封君研究》（修订本），湖北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37页。何琳仪、史杰鹏、刘信芳等则持不同意见，详参吴良宝：《战国楚简地名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2—76页。